

佳木斯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佳木斯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7年12月

责任编辑：孙景华

编 辑：化 雨

装帧设计：董大为

封面篆刻：赵 川

佳木斯文史资料

第 七 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佳木斯市人大常委会铅印室印刷

1987年12月出版

印数：1,500册 字数133,200字 工本费：1.80元

前 言

这辑文史资料包括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和少数民族文教部分，总共辑入20篇文稿，是个文教专辑。它与前辑印发的工商业专辑相衔接，就其时代背景和历史的演进节奏来说，也可以说是姊妹辑。

佳木斯地区文化开发较晚，曾被清代统治者视为“龙兴之地”而划为封禁区，不要说传播近代文化，就是外地人民也不准随意迁入。后来开禁放垦，随着成批的移民和一户户“闯关东”的人们逐年增多，近代的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事业才在这里兴起。我们从这辑文史资料中可以看见这里的近代文化拓荒者所经历的艰难路程，从而了解他们开发三江平原文化的苦心。

更能发人深思的，是大批知识分子具有纯真而又火热的爱国之心。他们为改变这里的文化落后状态，为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鞠躬尽瘁，竭诚奉献，进行了艰苦卓绝、舍生忘死的奋斗。中共黑龙江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陈雷撰写的亲历史料《桦川中学和佳木斯抗日斗争的崛起》，便是这批仁人志士的缩影。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人口数量最少的赫哲族，经过努力，也改变了文化落后的状态。这是令人鼓舞的，在这辑文史资料中也有反映。

我们在征集这辑文史资料的过程中，得到市属各县（市）政协的大力支持，桦南、汤原、富锦、同江、桦川等

县（市）政协都提供了数量不等的协作稿。这些稿件在这辑文史资料中辑入了一部分，其余的还要在以后陆续编发。这是市县协作的良好开端，我们对此深表谢意。

——编者

1987年12月20日

目 录

教 育 部 分

桦川中学和佳木斯抗日斗争的崛起…… (1)

陈 雷

披肝沥胆办教育，掩护革命全大义

——记依兰中学老校长薛绶宸…… (13)

李智明

张耕野在桦川中学…… (19)

魏燕茹

佳木斯教育事业的诞生和发展…… (28)

魏燕茹

桦南县教育事业的三个阶段…… (50)

李 艺、苏 来

在桦川国高尝受的奴化教育…… (57)

董 琦

一座历史较久、富有革命传统的学校

——回忆我所知道的富锦中学…… (66)

刘礼非

忆兴亚小学…… (77)

孙 复、陆凤歧

解放战争时期的桦南联中..... (81)

李艺、苏来整理

卫 生 部 分

佳木斯医学院的创建..... (86)

孙管方、王汝华

回忆解放战争中的合江军区医院..... (97)

官 铎

回忆我的父亲曲寿箴..... (102)

曲伟华

回忆我从事中医工作的经历..... (110)

曹立平

文 化 部 分

三江平原解放前的戏曲活动..... (129)

王 越

富锦县戏曲活动的演变..... (135)

夏 凉

郭重光与西河大鼓

——回忆我父亲的书曲生涯..... (144)

郭春琴供稿

戏曲艺人王丽影的经历与艺德..... (155)

孟 彬

体 育 部 分

河北形意拳第 1 1 代传人刘锡珍…… (165)

王甫翔

少数民族文教部分

我所知道的赫哲族文教实况…………… (180)

尤金良

赫哲族渔村和我的绘画艺术道路…… (191)

尤勇贵口述

庄继德、杨秀丽整理

桦川中学和佳木斯抗日斗争的崛起

陈 雷

（编者按：本文作者陈雷同志自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长期在我省担任领导职务，曾任省委副书记、省长，现在是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桦川中学是他的革命摇篮。他在这里参加中国共产党，而后转入抗联部队。这次应邀撰稿，事隔50年，而对当时那些革命师生的记忆犹如昨日，写得栩栩如生，读来倍感亲切。由此可见作者对当年的战友和同志怀念之深，也可见亲闻、亲见、亲历的史料是何等珍贵！我们相信，这份史料不仅具有很好的史学研究价值，而且对广大读者增强爱国热情，继承革命传统，献身“四化”大业，具有很深的启迪。）

1931年（民国20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强行侵占我东北大好河山，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置东北三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这国破家亡的时刻，有觉悟的中华儿女揭竿而起，拿起各种武器，打起各种抗日的旗帜，在东北各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

当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还没有踏入佳木斯的时候，民心已处于惶惶不安之中。人们悲愤交加，切齿痛恨之情愈演愈烈。这正是深秋季节，秋风扫落叶，人们不禁产生一种特有的凄凉之感。

国难当头，民怨沸腾，尤其立志读书的青年学生更是心火如焚。有心救国的老师们都叹息不迭，一时没有对策。想要奔走呼号，唤起民众，还不知县政府当局是什么态度。

幸好，在秋风猎猎的一天，佳木斯（即桦川县城）这个镇子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上百的朝鲜族群众，其中也有些汉族人，有男有女，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服装，还有反穿皮袄的，又舞又跳，高喊“反对日本侵略东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其实他们跳舞是为了吸引群众，进行抗日宣传则是他们的真正目的。看来他们是很有组织的，队伍秩序井然，鱼贯而行，据说这支队伍是从汤原县来的。他们在佳木斯长街奔走呼号的行动，并未引起桦川县黄衣警察的干预。

汤原县来的朝鲜族和汉族联合组织起来的群众队伍，在佳木斯进行反日的宣传活动，象一棵引爆火线一样引起了具有急切爱国思想的师生们和广大群众的注意。唐瑶圃、张耕野老师率先提出，要率领我们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为反日救国而呼号，使民众知晓，国难当头，要团结起来，拚命抗争。其他老师如校长卢国士、史地教师刘哲夫、语文音乐教师陈寓文等都同意这个正义之举。

这是桦川中学革命的第一个行动。

学生队伍出发前，也曾顾虑受到当局的干预怎么办？但是，考虑有朝鲜族群众为反对日本侵略而上街示威游行的先例，预料旧县政府的官员也不会不顾大义的，又兼他们摸不清上方的意旨，何去何从，也是焦急得很，象“热锅上的蚂蚁”，无暇顾及，能奈我何？

桦中的师生一行约二百来人，互相壮胆，终于打着旗

帜，在唐、张二老师率引下，有组织地出了校门。经过县政府警卫森严的大门前，高喊反对日本侵略的口号，那些警卫们也只是以惊奇的目光远远看着学生队伍，根本不象有干预学生游行的意图。

过了这一关，师生们的胆气就更壮了。学生队伍行进在商业繁华的大街上。在从西门里到东门外的途中，游行队伍又扩大到三、五百人。一些社会群众也参加进来，浩浩荡荡，那就数不清了。大街两旁的观众更是人山人海。此时我们这些游行者，感觉到那些观众是同情我们、支持我们的，说明中国人都不愿意当亡国奴。这使我们的认识上升了一步，这就是：正义的行动，总会得到人们拥护的。

学生游行队伍进行反日宣传的第一个行动之后，还觉得尚未尽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义务。进一步做什么？大家都在思索着。

1931年（民国20年）进入了冬季，听说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了哈尔滨，并向齐齐哈尔市推进。这时，马占山英勇地进行了嫩江江桥抗战。这个消息一传开，极大地振奋了东北人民，当然对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更是振奋不已。

唐瑶圃老师善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他提议：“我们演剧募捐，支援马占山。”于是在他亲自组织导演下，借京剧“戏园子”的场地，以男扮女装来表演了话剧《红楼梦》的片断：“黛玉葬花”和“刘姥姥进大观园”。唐瑶圃以女腔在幕后代替台上演员唱了“葬花词”。尽管师生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因演出水平不高，加上在这样荒僻的小镇演这种话剧，远不如京剧那么“叫座”，但是师生们一棵棵真挚救国之心都溢于言表，当无愧于三江父老和江桥

抗战的英勇志士了。

后来，马占山在江桥抗战失败的消息传来，给了师生们精神上以很大的打击。原来我们寄希望于江桥抗战的胜利，借此教训教训日本侵略者，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不是好欺侮的。可是，事不随人愿，马占山失败了，我们的希望也渺茫了。

但是，我们的老师唐瑤圃、张耕野并未因马占山江桥之战失败而灰心。他们继续鼓舞我们立志救国，讲花木兰从军的故事，马援马革裹尸的故事，以及岳飞、文天祥的抗敌故事，直到洪秀全、杨秀清革命和孙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故事，都在我们心目中刻上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们还说，丁超、李杜还在抵抗日军的侵略行径。这又重新点燃了我们心中的希望之火，激起了我们的“救亡之志”。

1932年（伪大同元年）春，日本侵略军向松花江下游进攻，丁超投降，而依兰镇守使李杜也顶不住了，未等日本侵略者至依兰，他就率领骑兵队伍经过佳木斯东遑苏联，还叫学生们列队去欢送。

在那马蹄扬尘的街道上，是一片昏沉的景象。李杜一句话也未说，以其肥大的身驱，骑着奔马仓惶地过去了。那时，我们的心情真是难以言状。谁能给我们做主，我们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也正是这时，桦川中学又因没有经费来源而停学了。真是“祸不单行”啊！教师们各奔他乡，我们一些乡间的学生也都各回自己的家乡去了。这一年我当了“半拉子”种地的农民，出田暴垄，初尝了一点春耕、夏锄、秋收、冬藏的实践。

那年，松花江激涨了茫茫大水，日本侵略军乘军舰、轮

船进占了佳木斯，真是天下大乱了！

日本侵略军来了，人心不服。诸如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等带有迷信色彩的武装组织拉起来了，什么“九江”、“八河”、“占山好”、“草上飞”、“五龙”、“窜地龙”等等绿林性质的“络子”也拉起来了；那些家有钢枪武器的地主为保卫自己的武装和土地也拉起来了。这些队伍，虽称抗日，但都各自占山为王，各图己利，不讲团结。尤其他们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只求一时的痛快，长枪走马，遍地吃喝，没有明确的目的和长远打算，而且组织松懈，纪律很差。不过他们号称抗日还符合老百姓心愿，所以老百姓还是好好地招待他们。当然普通百姓对挎枪的“老总”是不敢得罪的，虽然厌恶他们的抢掠奸淫，而内心则希望他们好好地**在抗日救国的道路上走下去。**

也是事有不至，理有固然，由于这些自发起来的各种抗日队伍先天不足，素质很差，到处虏掠，多不改其匪性，民不堪其忧，没有民众的基础，在日伪军的追剿下，很快就都溃散了。

不过，红枪会之进攻佳木斯，马家大桥黄枪会与日伪军的殊死战斗，他们为保家卫国而拚命厮杀的英勇行动，仍然在人民心目中留下了可资回念的印象。

1932年（伪大同元年）真是天翻地复大动荡的一年。这一年，从日军侵占佳木斯，以日本旗和伪满洲国的黄旗代替了旧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到各种抗日队伍揭竿而起，抗日斗争风起云涌，同日本侵略军进行初步较量，直至相继溃败，其忠诚可嘉，但却给人们留下了血的教训。

正是1932年（伪大同元年）这一年，以唐瑶圃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佳木斯建立了党的组织。唐瑶圃与张耕野、董仙桥是亲密的战友。在他们领导下，秘密的抗日救国活动随之开展起来。1933年（伪大同2年）他们走家串户，劝说原来桦中的学生回到学校去读书。学生们初有疑虑，因为都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军一来，把鸦片烟馆、赌博场（宝局、会局、掷骰子等等）都开设起来了。这是对人民无形的剥削和精神上的残害，简直是暗无天日。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读日伪之书也不会有好结果。但是，董仙桥和张耕野却以“读书救国”的主张，打动了学生们的心弦。于是我也从中学的二年级生直接插入桦川中学新增设的师范班。

我看到当时党的策略，就是接受自发的抗日斗争的教训转入秘密的有组织的抗日斗争。是要教育学生并通过他们去宣传群众，坚定群众抗日的必胜信心。学生也在暗地里说：

“日本话不用学，三年用不着”，以此来互相鼓励，决心以身许国，誓死不渝。

学生跟着革命的老师，学到了不少革命的启蒙知识，也学到了一些在敌伪统治下从事革命秘密活动的能力和斗争艺术。董仙桥老师在课堂上以讲学术为名，向他们介绍苏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主张，使一些有志于革命的贫苦学生心驰神往。这就是桦川中学为什么有很多学生参加东北抗联的根本原因。这又证明：有了革命的理论，才有革命的行动。

从1933年（伪大同2年）后（唐瑶圃老师早已转到依兰中学），佳木斯周围各县，党又领导了许多次农民暴动，既震撼了佳木斯的日伪统治，又极大地鼓舞了我们从事

抗日活动的革命者。

这时，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遍及城乡，譬如在佳木斯当时共产党组织就有两个支部，一个在市内，由张耕野领导；一个在西门外，由董仙桥领导。两个支部的党员不准发生横的关系，这是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严守的纪律。

1934年（伪康德元年），我参加在张耕野家组织的“读书会”，从阅读小说中吸取反帝反封建思想，如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苏联小说《铁的奔流》等等，很快充实了一些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至此，很多向往进步的学生才相信“读书救国”就是以读书之名，行救国之实，是有道理的，走救亡之路，无不乐而从之。

但是，革命的实践是最能鼓舞人和教育人的。由于党在农村的革命活动扎下了根，佳木斯周围的县，如汤原、依兰、桦川、勃利、富锦等县都建立了县委。佳木斯（当时桦川县城）的西郊，在桦川县委领导下建立了通区（黑通）、岗区（大赉岗）、火区（火龙沟）等区委组织；在佳木斯以东富锦县的西部也建立了集贤、沙岗等几个区委组织；至于佳木斯江北的汤原县各区大部分都有党的组织。不仅如此，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还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是半公开的政权组织）、“妇女抗救会”、“少年先锋队”、“青年游击连”、“肃反队”（又称“打狗队”），以及传递鸡毛信的“交通站”等等。这样，在农村群众反日组织林立之时，也出现了党领导的初级抗日武装，它给佳木斯的日伪统治以很大的威胁。这无疑对佳木斯党组织开展抗日工作

是非常有利的形势。

在1934年至1935年（伪康德元年至2年）间，基本上是敌占城市，我据农村。敌人进入抗日游击区（通称“红地盘”）都是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地试探着前进。而当时的游击区的活动，则处于半公开的状态。这在壮大人民抗日志气方面是好的，但缺乏隐蔽工作和作长期与敌斗争的准备。由于农村党组织的活跃工作，特别是在党领导下农村抗日武装的崛起，都需要佳木斯市党组织给以支持。特别是从汤原游击队到抗联第六军成立先后，在购买武器弹药方面，在解决军装所需的布匹方面，在供应伤员的医药方面，以及宣传所用的纸张方面，乃至为抗日游击队通报敌情方面，都是佳木斯党组织自觉承担起来的重要政治任务。

从事这些工作，危险性是很大的。要靠机智和勇敢。其中很重要的条件是要到各方面找熟识可靠的人，拉关系，找线索。应当说，这些不拿枪的战士在敌人严密统治的城市里进行抗日活动，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他们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譬如，当抗日游击队缺少药品而大量购买又不方便的时候，我们就派一个贫苦的党员学生，中途辍学，到同学魏喜才家开办的“中西医院”去学徒，这个同志的名字叫温庆和。后来他三年满徒，组织上派他到大赉岗，自己开了个小医院，这对支援抗联六军的队伍就更方便了。在佳木斯“三·一五”事件敌人进行大搜捕后，据说他逃亡到北平，后来不知下落。

至于给游击队买纸张，都由参加革命的学生们分散去完成。但是买多了也怕人盘问，所以事先都要准备好应付自如的话，以免出破绽暴露目标。

特别是为游击队买子弹，则要非常细致地找那些比较可靠的人去探索，有时直接交易，但大多时候是经过第三者的间接交易，特别还要选好交货地点，以蒙蔽敌人，并迅速运走。

抗日工作者为游击队买布匹，有时还假扮商人进镇购货，用从游击区来的马车，直接拉出城外，交到游击队指定的地方。

抗日工作者稍一不慎，随时都有被敌人抓去杀头的危险。那时，敌伪的统治，特务如毛，还有什么“狗腿子”之类的东西，他们经常用监视、盘查、盯梢的方法来对付他们认为可疑的人。1936年（伪康德3年）夏，在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温庆和同志在写字时无意中写了“中国”两个字，被日伪特务发现了，立即被抓进伪三江省警务厅。我们与他有联系的几个同志听说此事，很快躲到乡间游击队隐蔽起来。大约经过一个星期多，被捕的同志，虽经敌人的残酷刑讯，拷打，灌凉水，但没有暴露革命的秘密。敌人查无证据，后取保释放，避免了一次大的损失。

佳木斯的党组织，不仅为抗联游击队购买各种物资出了力，而且在秘密医疗伤员方面，也是冒风险而竭尽全力的。下江特委书记黄成植同志因肛门受伤，我们党组织的负责人董仙桥同志冒着极大的危险，把黄接到他家去治疗。当时的董家，是佳木斯西门外的一个大户人家。虽然敌人对这种家庭注意较少，加上董仙桥有从事中学教员的正常职业，但是也曾遭到日本宪兵的突然搜查。幸好，董仙桥的家人把黄成植同志藏在院内西北角的一座小房里，又将黄伪装成女人，他见到日本兵一进屋，就装做女人声调哼哼呀呀的叫，日本

兵一看是个女病人，在一个阴暗的屋子里，气味也不好，捂着鼻子，扫兴而去。佳木斯党组织就是这样冒着生命的危险掩护自己的同志。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佳木斯党组织为东北抗联输送了不少知识分子，充任部队的政治干部。如1936年（伪康德3年）春，将张金声输送给第五军当某部指导员，到部队改名为“宫尚贤”，后作战英勇牺牲。白长岭在1935年（伪康德2年）转依兰师范学校，于1938年（伪康德5年）7月参加抗联第三军，改名叫赵敬夫，后任抗联第三军三支队政治委员，1940年（伪康德7年）德都朝阳山之战，为保护李兆麟而英勇牺牲。还有著名的《八女投江》的指导员冷云（原名郑志民），她于1937年（伪康德4年）参加抗联第五军，1938年（伪康德5年）夏季在林口县乌斯浑河受敌阻击，她指挥女同志英勇杀敌，打尽了所有子弹，最后终因寡不敌众，为不做敌人俘虏，冷云同志率领七个女同志一起跳入滚滚的牡丹江中而壮烈殉国，充分表现了中华儿女宁死不屈、壮怀激烈的民族豪气，她们真正无愧于巾帼英雄这一光荣称号。佳木斯市委派到抗联的还有马克正、陈芳钧、白云龙、赵连义等同志，他们在抗联的建设上都起了重要作用。

唐瑤圃同志在依兰任县委书记，后转到吉东省委，随抗联五军活动于牡丹江地区，后作战牺牲。他那瘦高的身材，文雅的风度，以诚待人的精神，至今还在我的心目中萦回。一想起他，我便想到他那谔谔之士，令人钦敬不已。

张耕野同志在佳木斯“三·一五”事件时，安排妻子、妹妹回到双城老家，他便撤离了佳木斯，在集贤夹信子一带